

# 误读的文化影响

蒋才姣, 蒋湘莲<sup>①</sup>

(湖南工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 误读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对文化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误读可能促进文本阅读的创新、文本创作的丰富以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可能破坏对原文本的审美内涵和价值的理解,阻滞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误读观,以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误读; 文本阅读; 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1-0097-04

## 一

误读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对文本的解释还是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处处会留有误读的痕迹。误读虽有“误”字的名头,但不能说所有的误读都是消极的,应该避免和批判。误读指的是接受者运用了不同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对文本进行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解读,主张将误读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价值判断,分析误读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双重影响。

## 二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疆界不断被打破,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被卷入到不同文化范式的碰撞之中,使得跨文化的交流面临着更加深刻而又复杂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误读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对世界文化由封闭走向沟通与对话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一,误读能够促进文本接受意义的创新。布鲁姆指出:“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

生存的。”<sup>[1]</sup>他强调诗歌就是后辈诗人对前人及其作品误读的结果,把“误读”与创新联系在一起,认为误读是“创造性的校正”,这种修正是文学意义产生的基本方式,修正者力图重新发现,作出不同的理解与评价,从而使文本意义有了新意。误读对文本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误读可以为文本解读提供新的视角。误读者如果打破文本创作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作者的意图,或者摆脱固有的阐释框架,从新的文化历史体系出发,在某个层面和角度上去偏离前人,重新解读文本,就为文本提供了新意。就某一文化体系而言,它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可能凝固僵化。今天读者的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已经和古人大不相同,这除了社会发展以外,无疑与不断吸收异质文化、异质文学的误读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的“西学东渐”使古老的华夏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使国人能够从新的立场、新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的文化与文学,台湾学者刘绍铭在列举了英美非汉学家在解读《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选集》时发现中国小说里的男主角对女人缺乏高贵的情操和品质,当危机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发足狂奔,这种解释从另一角度启发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短篇小说中复杂的文化现象的思考。这种误读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批评的拓展。美国人把三仙姑误读为一个心态年轻、热爱生活、充满生命力的女人。一部作品在本民

**[收稿日期]** 2011-11-02

**[基金项目]** 湖南工学院科研资助项目(编号:HY09010)

**[作者简介]** 蒋才姣(1971-),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工学院高级讲师。

<sup>①</sup>南华大学期刊社编辑。

族文化中基本形成共识,但从另一文化视角来解读往往形成具有“陌生化”效果的新解释。如果排斥误读,只用单一的理论模式和阐释体系去解读文本,无疑我们会成为井底之蛙,因为局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体系就无法把握和理解文本的多重意义,更不能促进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误读能使文本意义增值创新,呈现出生生不息的动态感和鲜活感。文本一经产生便形成了固定的样式,但它客观上所蕴含的文本意义、审美内涵和精神价值却不能够为作者左右,而由读者去释义。“在作者的意图跟读者的意图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吻合与一致性,可能只有并存性;就是说,读者在作品中能够找到或想找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非作者原本急切想写进去的,或者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sup>[2]137</sup>所以,处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读者对文本都有可能进行各自不同的误读。从文本解读产生的意义上来说,误读与正读一样能够使文本的内涵和意义丰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原是一篇“颂扬新兴殖民主义的说教”,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原本是一部“辛辣的讽刺小说”,但直到现在它们还是经久不衰,缘于它们“加入到儿童文学的圈子之中”,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鲁滨逊漂流记》与《格列佛游记》在人们对它们的误读中所产生的新意可能令作者都会为之一惊,但后来的读者从作品中挖掘出来的意义确实比作者的原意及作品既有的释义更丰富。这种误读是创造性的,无疑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sup>[2]137-138</sup>正是因为有了误读,《鲁滨逊漂流记》与《格列佛游记》甚至更多的作品才能不断折射出时代的光彩,在读者的理解接受中实现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可见,读者极富创意的“误读”,赋予了文学作品的生生不息的动态感和鲜活感。犹如韦勒克、沃伦所言:“倘若今天我们可以会见莎士比亚,他谈创作《哈姆雷特》的意图可能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仍然可以有理由坚持在《哈姆雷特》中不断发现新意,这些新意就很可能大大超过莎士比亚原先的创作意图。”<sup>[3]165</sup>因此,当误读增加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时,这种误读具有积极意义,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其二,误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本创作的丰富。对某一文本的误读,常常会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使作者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进而创作出新的作品。一方面,就读者而言,对文本的误读,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读者可以读出作者自己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甚至连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想到要表达的意义时,这可以说是对作者创作的一种促进。因为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正读,即追求与文本意蕴、作者创作目的、文本艺术价值一致的接受活动,相应的结果是作者的原意成了衡量作品解读正误的唯一标准,读者的接受反馈只能局限于作者的意图,固步自封,永远无法创新,由此对于作者的创作也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和推动的作用了,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而误读作为一个反馈的过程,把接收者对文本的接收信息、文本的审美情况反馈给作家,于是作家整理、分析、研究这些反馈来的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 and 方向,创作出新的符合读者审美情趣及需要的作品。所以,作者期盼着读者能从自己的作品中有所发现,读者对作品的误读,会促使作者不断的思考和再创作。因此,从某个意义说,读者的误读成了推动作家创作的外在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就作者自身的创作而言,他不但是一个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当他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品进行误读时而出现“灵机一动”的想法,这种想法同样会激起他创作的热情。这一过程便拓宽了作者的审美视野,扩大了主体的审美追求,使其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这种现象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屡有发生。庞德通过对中国古诗和汉字的误读,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比如他把《诗经》中的“静女”翻译为“lady of azure thought”(青色的思想仕女),因为“静”字中有“青”,他用词源上的分解法理解汉字,只从文字中发现具体的意象,忽视了中国汉字的构成不仅有形部还有声部,这可以说是对“静女”的典型误读。但正通过他的误读,把中国古诗译成节奏明快、表达简练的意象诗,开辟了西方意境优美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推动了英语文学中意象主义诗歌的形成和繁荣。

其三,误读能促进世界文学、文化的交流与交往,丰富文学和文化的内涵。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面临不同文化体系的壁垒和沟壑,于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误读,要消除和避免误读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当异质文化相遇时,误读有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误读首先打破两者文化之间的无联系状态,然后通过认同、接受、生成新的意义,不断产生新的文化内容。

误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文学、文化的交流与交往。著名导演李安拍摄的《卧虎藏龙》,许多国人认为其误读了中国文化,但正是李安运用了美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眼光,才使更多的美国观众有了了解和接受我们东方武术、东方音乐和东方情

感的契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误读是通向文化交流的前提。“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于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吸取新义,还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sup>[4]</sup><sup>111</sup>假如我们简单地恪守着一种文化观念,运用固定的思维模式来解读文本的话,常常会走进死胡同。这时我们可以变换不同的视角和模式,产生新的释义。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对他种文化不求甚解的借口,或者是戴上有色眼镜对他文化进行任意的歪曲的理由。如果缺少对异己文化的深入理解、揣摩和钻研,缺少深厚的文化知识积累和沉淀,也就难以出现独创性的解读。所以只有对异己文化文本进行认真深入地“读”,才能谈得上合理的“误读”。

### 三

误读虽然在文学和文化发展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误读中的“误”字本身就设定了一个标准,它是与原文本意义不相符合的解读。如果不加规范与限制,任意解读,那么就会破坏对原文本的审美内涵和价值的理解,阻滞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其一,过于强调误读会造成对文本理解的随意性,从而忽略了文本的实际意义与价值。接受者对于异质信息既有吸收过程,又有淘汰过程。接受者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将那些符合自身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信息,同化到自己的阐释体系上来,组成新的审美图式。对于那些不同于自己文化体系的陌生的信息,则往往视而不见;对于那些完全相悖于自身的社会文化体系的信息,则统统排斥。这样那些真正能体现异质文化本质的一些审美信息,就在信息的过滤网中被淘汰掉了;那些被接受者认同的审美信息不断得到了强化。比如,詹姆逊通过对中国现代作家如鲁迅、老舍、王蒙等人的分析,如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狂人日记》,认为作品表面上好像讲述私人或情欲性的故事,其实同时也在讲另一个关于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故事,因而中国文学是一种“民族的寓言”。事实上,中国文学不仅是“载道”的文学,更是“缘情”的文学。中国现代作家如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等,他们的作品就不仅认同民族整体的历史变革、同时也尤其关注作为主体的个人在历史中的失落,呼唤主体的觉醒和回归。所以,詹姆逊对中国文学的误读虽然揭示出了中国文学中明确的社会历史观和推进社会政治变革的要求,但是“无所

不在的意识形态滤色镜却使他似乎忽略了第三世界文学中个人性的要求,忽视了他们追求个体独立人格的塑造和个体生命意义的努力,也忽略了诸如中国文学悠长历史中对于文学本身审美精神价值的传统。”<sup>[5]</sup>

虽然,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不能完美地认识一个客体的性质,但我们却几乎无法否认一个客体就是这个客体,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或者误读它。我们总是抓住客体中某些“决定性的结构”,这就使我们认知一个客体的行动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创造或者主观的区分,而是认知现实加给我们的某些标准的一个行动。“与此相似,一件艺术品的结构也具有‘我必须去认知’的特性。我对它的认识总是不完美的但虽然不完美,正如在认知任何事物中那样,某种‘决定性的结构’仍是存在的。”<sup>[3]</sup><sup>169</sup>所以,我们在承认误读的对文化的积极影响之时,不能排除文本意义的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意义的存在,即正读的存在。

艾柯指出“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sup>[6]</sup>如果读者的权力被无限夸大,可以对作品进行任意的解读,结果只能使文本的解读混乱,从而导致文本真正的内涵和审美价值的丧失。

其二,误读有可能影响对于别民族文化的正确理解,从而阻碍了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与发展。误读者通常按照自身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阐释体系去解读另一种文化文本,不可避免会产生文化上的误读。这种误读固然能促进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发展,但是也有可能妨碍对他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把握,主要表现为两种作用方式:一是理想化的误读。主观地抬高、美化异己文化,在这种误读方式下,异己文化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崇洋媚外”就是这种误读最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崇洋”指一种文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一切来自遥远异己文化的陌生、不同的事物都显得美丽诱人。近代以来欧洲文化的输入,有不少中国人做起了强国富民乃至个人发财的“西方梦”或者“美国梦”。人们从西方寻求真理,不自觉地“西方”理想化了,对于西方的文化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正如鲁迅所说“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sup>[7]</sup>,这种对西方的理想化的误读使中国文化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同样,欧洲也曾经用“崇洋”的眼光来误读中国和中国文化。自17世纪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艺术几乎变成中国

式的。所以,这种理想化的误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文化征服,演变成文化霸权主义。

二是否定式的误读。由于接受主体对异己文化感到陌生,甚至悖离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本民族文化心理。所以在接受异己文化作品时,易于产生否定性审美情感和效果,从而直接导致审美效应的减值。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欣赏不了贝多芬的交响曲,于是给了对方近似嘲讽的否定,他说“村妇所唱的歌儿实在是真正的艺术,能传达一定的强烈的感情,白曹文的一零一曲谱却只是艺术上一不成功的试验品,不含着一定的情感,所以一点也不能传染给别人。(此处的“白曹文”是指“贝多芬”)”<sup>[8]202</sup>这些评述明显地说明了审美主体对异己文化的陌生与主客体在审美观念与审美趣味上的矛盾和对立。因为托尔斯泰站在“为人生的艺术”的立足点上,他所欣赏的是不粉饰的和人民的歌谣相似的艺术,对于唯美派、神秘派的文学及其他艺术则攻击得体无完肤。“俄国自那个时候来,政治上的黑暗,人民积极要求解放,在这惨澹痛苦的环境里,自然不能不排斥一切娱乐的、无目的艺术而力求有益于人生的艺术了,这种艺术必然切合于农民与为农民而活动。”<sup>[8]2</sup>所以,托尔斯泰对贝多芬的误读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俄国的社会阐释体系所致。不过,排斥和否定的效应也来自于审美主体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上个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曾到欧洲游学,亲身体察了西方文化现状,回来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说是西方濒临严重的精神危机,几乎已是朝不保夕,因此大声疾呼要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结果并未拯救别人,倒是国内崇奉国粹,热心复古的浪潮大大盛行起来,延缓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sup>[4]111</sup>

由此可见,误读如果影响了对于其他民族文化

的正确解读,同时又不能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阻滞世界文化的有效交流与发展,这种误读就具有消极意义。

#### 四

从根本上来讲,我们既不能把对原文本的误读放在一个确定的标准中去批判,也不能把误读后的成果当作一种神圣性的成果去追捧。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误读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误读,积极发挥它的积极性价值和意义,尽可能避免误读的消极性影响,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补给各自所需的文化养分,促进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1.
- [2] [法]罗贝特·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3] [美]勒的·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4]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M]//乐黛云,勒·比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5] 陈跃红.文化壁垒、文化传统、文化阐释[M]//乐黛云,勒·比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41.
- [6] [意]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8.
- [7] 鲁迅.拿来主义[M]//鲁迅杂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13.
- [8] [俄]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M].郑振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20.

## Cultural Influence of Misreading

JIANG Cai-jiao,JIANG Xiang-lian

(Hu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engyang 421002,China)

**Abstract:** Misreading, a literary reception phenomena, h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culture. On one hand, misreading is likely to make innovation in reading, enrich text creation and beneficial to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nverg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perhaps cause a barrier to appreciate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value from source text, holding back cultural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a proper misreading concept is supposed to be set up to promote world cultural blossom.

**Key words:** misreading; text reading; cultural influence